



“只有让苏维埃的‘钱袋子’鼓起来，才能支撑起革命的‘枪杆子’”。近日，我省原创话剧《钱袋子》再次在南昌红谷滩大剧场上演。《钱袋子》以中华钨矿公司为背景，艺术再现了那段革命历史，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共和国第一国企”的红色传奇和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劳动者群像。

—编者

在宏大叙事中看见细节的生动

□ 肖星辰

题材宏大的作品，在表达上往往容易流于抽象和空洞。但《钱袋子》成功地在宏观叙事与微观细节之间找到平衡，将一段革命历史具体地再现于舞台之上，带给观众惊喜。该剧在艺术表达上实现了写意与工笔的结合，既展现出了浪漫的诗意，又不乏扎实的细节描写。从而在主题上，既展现出共产党人浪漫的革命情怀，又流露出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与诗歌、小说、散文这三种静态的文体不同，戏剧包括静态的剧本和动态的舞台表现，缺一不可。《钱袋子》的平衡表现在剧本方面，是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独特性的生动结合；在舞台表现方面，是声、光、舞美效果的具体性和象征性的诗意结合。

在人物塑造上，《钱袋子》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比如毛泽民，临危受命成为钨矿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解决钨矿公司发展面临的内忧外患，他翻越崇山峻岭，请工人中的探矿行家老陈皮出山；身体力行地教育引导工人中的“大力士”八尺走上正途，并提出股份制的改革方案，展现出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品质。而老陈皮和八尺身上，则不约而同地展现出工人吃苦耐劳、善良朴实的品质。

然而，一味强调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容易使人物变得脸谱化，从而缺乏真实性。《钱袋子》通过同类人物不同个性的塑造，避免了这种脸谱化。比如同为共产党员的华汉与毛泽民，华汉反对毛泽民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也不同意他吸纳八尺和陈陈皮入党的建议。他们之间的冲突既反映了钨矿管理层的内部矛盾，也在更大层面上展现了革命过程中不同理念的碰撞。但这种理念上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华汉在“抢运钨砂至渡口”的一幕中，冲在与阻碍运砂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最前线，就展现了他作为党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演员精彩的表演对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功

不可没。比如，在塑造华汉时，演员强化了中央特派员的南方口音，并凸显了他有些教条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次，舞台设计也帮助人物形象更立体。化妆和服装设计自不用说，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老陈皮第一次出场是在一场群戏中，他被安排在舞台右前侧较暗的位置，本来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但观众却难以忽略他。因为在相对静止的画面中，他点燃的烟枪中冒出了一缕动态的白烟，立刻吸引了观众的视线。

正是静态的剧本和动态的舞台设计的匠心运用，使得《钱袋子》塑造出了具有典型性及独特性的人物形象。

在舞台表现上，话剧《钱袋子》的音乐、灯光、美术等既给予观众直观的、美的享受，也传达出一种意犹未尽的象征意味。《钱袋子》的舞台美术效果非常出色，不仅具有美感，还能恰当地表现情节。例如最后一幕，工人们加入长征队伍，但长征的宏伟场景难以在有限的舞台上表现出来。《钱袋子》的设计团队用一幅结合了古典油画典雅肃穆特色，又具备公共雕塑文化意义的定格画面，巧妙地解决了这个技术上的难题，赋予这一情节更多美学张力。舞台上，在一片红色的、抽象的群山背景前，大家排成一排，或挑着担子，或扛着枪，或振臂高呼，或举旗朝前，动作各有不同但都脚步向前。在人物关系上，他们几人为一组，相互照应，又在整体上构成了一支团结的队伍。这一幕用“静”的画面，展现“动”的长征；用“个体”的不同，组成“集体”的相同。在这一场景中，工人和军人在正面对抗逐渐暗下去后，化成一个黑色的剪影，被背景中壮丽的红色河山衬托着，凝成观众脑海中难以忘怀的共和国英雄的群体形象。

在这部剧中，除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多次出现之外，还有象征着自然的“绿色”，象征着钨矿的“黑色”，共同构成了剧作颜色的象征意味。在毛泽民请老陈皮出山这一幕中，舞台上方降下一根根青

翠的竹子，继而组成了一片立体的竹林。随着演员由远及近地从竹林深处走来，观众仿佛也一下子从剧场穿越到了赣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感受到祖国山河的秀美。而象征着钨矿的舞台装置，由四块从舞台地面延伸至天空的背景板组成，形成黑色钨矿的壮丽景象，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氛围。

光影效果的巧妙运用也是《钱袋子》值得称赞的地方。例如，在老陈皮的提议下，钨矿场将小钨换成大钨，小锤换成大锤的一幕，聚光灯首先聚焦在抡动大锤的八尺和手握大钨的王有贵身上。接着，舞台暗处的灯光依次亮起，照射在一组组劳动中的工人身上。劳动号子伴随着一声声的敲击声和激动人心的背景音乐，展现出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的感人场面。又如，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时，以华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领导钨矿工人突围，将钨砂运往渡口的一幕，白色的舞台灯光高速频闪，节奏应和着观众起伏的情绪，使观众与舞台上的紧张场面同频共振。

《钱袋子》成功地展现了革命历史的宏伟画卷，同时也注重了细节的呈现，使得观众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众审美的不断提升，戏剧作品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现代化的手段和创新的叙事方式来吸引年轻观众。例如，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创造更加沉浸式的舞台体验；利用互动元素，让观众参与到剧情中来，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同时，在剧本创作和人物塑造上持续创新，打破传统的表达方式，使得戏剧作品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生活体验。相信随着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多的主旋律作品将会在未来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为观众带来艺术享受和思想启迪。

微评论

“我信你，你信我”

话剧《钱袋子》中八尺的人物形象丰满，他从土匪黄斑虎的马仔转变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离不开钨矿总经理毛泽民的思想教导，更离不开指导员舍命相救带来的心灵震撼。在这个过程中，指导员王有贵扶住大钨，鼓励八尺抡大锤凿矿石，两人配合时一句“我信你，你信我”，道出了共产党员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彼此信任就能攻坚克难、改天换地。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那段岁月里，钱袋子是一种意象。话剧《钱袋子》对“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问题交出了完整的答案。（方亮）

制作精良、故事感人

该剧制作精良、故事感人，服装道具布景在尽量还原赣南风貌让观众入戏的基础上，做到了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演员台词、形体基本功扎实，表演细腻生动，做到了生活真实与戏剧真实的统一。

同时，剧本在写故事、写冲突的同时塑造人物，明暗线交织，做到了生动与深刻兼备。剧中，明线讲述的是毛泽民依靠共产党员，团结带领钨矿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巨大价值的故事。暗线则是反复出现的时代背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江西怎么组织群众生产、怎么密切团结群众，影响了八尺、谢母、娇莲等一批群众参加革命生产的故事，塑造了这些人物的成长及个人意识的觉醒。（伍文璐）

跳出宏大的革命叙事

整部剧跳出宏大的革命叙事，直面中国在革命道路上遇到的历史困境和现实考验。当“理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是听从理念，还是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该剧通过人物的塑造作出了回答。

全剧围绕着“钨”和“大锤”主题意象展开叙事，在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中实现舞台诗意的表现和意义的开掘。这些具体意象不只是生产的工具，更是个人和国家紧密连接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当大锤和长钨配合起来，舞台色调由暗变黄，场景由“两个人”逐渐变成“一群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此刻具象化地呈现出来。空间的转化弥补了舞台的有限性，也让观众在真实与虚构中深化对革命精神的理解。（朱瑞）

《志愿军：存亡之战》：革命现实 浪漫铸魂

□ 火华

2023年8月15日，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三部曲杀青，次月底，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上映，斩获了8.6亿元票房佳绩。今年国庆档，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如约而至。

延续第一部讲述的人朝背景及入朝后的第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存亡之战》的时间线拉到了第三至第五次战役，并高度聚焦在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此时的战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奉命驻守铁原，经过13天的防御作战，63军运用“钉子战术”，以2.5万人对抗5万敌军，最终歼敌1.5万，取得了铁原阻击战的胜利。

铁原阻击战，第一部是擘画全体志愿军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图景，那么第二部就是记录英雄群像为生民立命的微观镜头。第二部的镜头更具人文视角，对大时代激荡下的小人物投去更多的关注。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默尹、李想、李晓一家人。

寻常百姓家的日常，让笔者想到同为抗美援朝题材的老电影《英雄儿女》，同样流淌着感人的父女、父子、兄妹之情。

但李家的下一次团聚，就成了为国赴战。他们的身份、立场、所处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炮火连天，兵燹不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李默尹是一位足智多谋、礼贤下士，认为“每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回家”的战场指挥官；李想是一名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前仍鼓励袍泽“继续前进”的战士；李晓代表着战场上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用“杀不死”的歌声提振士气。

在革命现实的影响下，李家人血脉相连，每个家庭成员又各司其职。他们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他们捐躯千万里，视死忽如归。两辈人舍小家为大家的义举，及对“家”的不舍，生动诠释了“你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我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

除了李家，影片中其他人也具有鲜明的性格。吴本正一身书卷气，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劲儿。他给战士们分

山果子，实则是在传递希望。孙醒失忆仍保有战斗本能，战损记录员杨三弟认为拍摄是为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能记住他们”，张孝恒牺牲的那个下午夕阳如血。杨传玉代表着救贖，“这回我没有害怕”是他永不磨灭的番号。还有那些无名英雄，仰天亢歌，至死不休……

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信念坚如磐石。这是我们的制胜法宝，也是敌军不具备的优良品质。战士们吃着粗制的面食和土豆，少了重武器的倚仗，抵挡住敌人疯狂的攻势。那是为什么？因为信念就是最强的武器。诚如电影所说，“在生死面前，他们都是勇士”。

在《志愿军：存亡之战》里，一块糖、一把钥匙、一朵小红花、首尾呼应出现的瓢虫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特别是那只瓢虫，重要性好比“陀螺”之于《盗梦空间》、“雨”之于《肖申克的救赎》、“白马”之于主旋律电影《八佰》，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哲学意味。这些符号绝不是为私人定制的，而是为群像所有。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英雄，谁没有收到子女寄来的糖果，谁没有收到恋人寄来的红花，谁没有见到那

只象征美好的“七星瓢虫”？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必然要强化技术突破和视觉创新。在摄制期间，剧组用了两万五千套服装，拍摄场地超过二十万平方米。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战争场景——冰原、森林、水道、高山。还可以看到突袭刺杀、抵近开火、步坦炮协同、坦克大战、地道战、火攻水淹等战争手段。焦点转移和快速摇摄成为镜头调度的主要方式，经典的“子弹时间”让观众不禁捏了一把汗。

笔者从小听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长大，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早已融入基因，极其宝贵的抗美援朝精神同样深入人心。最近几年，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陆续回国，国产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全国各地国庆升旗仪式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精神场人士人海……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志愿军：存亡之战》就是这样一部怀着骄傲，想念、招呼、注视英雄的浪漫佳作。

文艺观察

近年来，赣南涌现了一批女性散文作者：简心、朝颜、赖韵如、春序、皖心、张晓帆……她们紧跟时代，倾情抒写，其作品呈现出“在地性”写作的共性，从河流叙事、乡土风物、客家非遗等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着时空回溯，也对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给予积极观照——

倾情抒写赣南

□ 熊宏悦

河流叙事：生命之终始

“河流”是乡土文学叙事中一个古老的命题，既作为地标，也映射出村民间的关系与价值倾向。河流的宝贵在于孕育万物时所体现的生长性与包容性，亦如简心的《被绑架的河流》中所述：“有时，一群简单的水草，就是一片难以穿越的森林。”在河水与卵石碰撞下，村庄被挤压出褶皱似的支流，人们在支流里放排，行商；坐船外出求学，上任。

人们的生活与河流息息相关，简心的《午月首事》中就有“发水财”这一说法。在朝颜心中，那供一家人挑水取用的小河在涓涓不息地供养着这一条深深扎进土壤里的血脉。赖韵如在《水之秘径》中写道：“生养我的地方，是赣水之上的一处小小的源流。我的村庄叫马溪，它周边的村坊，几乎都以溪流命名：桃源、圆溪、沙溪、玉带溪、月亮溪、金钩挽水、三条圳……”春序的《一条河流的记忆》中提及“这条河自南向北一路走来，哺喂着太平堡的子孙”。在《放排江河》中，春序回忆了父亲“吃水上饭”的往事。“一排排木排顺河而下，江河迢迢，水流湍急，河床弯曲，暗礁密布。”“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村庄，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桥梁，有桥梁的地方就有河道，这些河道曾经是乡民通向外面世界的财富之路。”皖心在其创作谈中提到：“千百年来，这条护佑着苍生承载过无数命运的河流，一直在用蜿蜒的方式，述说着自己的过往。”不断奔涌的河流携带着生命一起往前流动，水的前进与干涸，岸的热闹与沉寂，日升月落与家人的归处都与河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四通八达的河流岔道被人们不断追溯和重构，最终人们发现了一个适合它的位置，那是一个回望家乡的位置，因为在那里存放着村庄共同的记忆。河流怀揣着人的过往和希望向前奔去，沿途灌溉村庄，串联起一户人家，其中不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但这些都后来生活中或多或少得到了消解。那些曾经或正在经历磨难的生命持续不断地发出声响，努力让声音穿透泥土，到达地面。

“食光”记忆：舌尖上的念想

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指出：“面临当下的全球化潮流，文化并非单一地趋向于同质化，相反在各种流动与断层中往往会生出一一些崭新的在地文化因素。”那慰藉乡民味蕾的地方美食，便是这种“崭新的在地文化因素”吧！

在山川育养的赣南，作者们将庄稼里的农作物和树木果实自然地放入了文学的取景框中。如《客路赣南》迸发出蓬勃的自然生命力量，《天空下的麦莱岭》浸透了对生命的反思，对食物抚慰心灵的感恩，《茶青和桃红》洋溢着茶叶的清香，《夹湖谣》则呈现出了对食物诚挚的珍惜……寒露籽、山稔子、茄茄、米筛杆、茶苞、水菌子、麦子、番薯、芋头、花生、毛栗子、枇杷、野杨梅等，这些大自然中的生灵欢呼雀跃地四散于乡间，作者们把它们当成了童年最好的玩伴，在灾荒年代，它们甚至成了救命的口粮。食物的形态从生长到成熟，历经数月的磨炼，不仅在人类的手中褪下了坚硬粗糙的外壳，显露出里面娇嫩可口的果实，我们在自然中攫取、收获，亦在田野中享受童心复归的乐趣。

依靠食物建立联系的还有村民，如《客路赣南》中的西风太婆、蓝嬷太婆，《水之秘径》中的阿爸，《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中的“我的父亲”、大伯与祖母，《夹湖谣》中的阿花姐、苗婆姨、秋嬷婶，等等。这群赣南作者敏锐地将儿时的人物经由食物和节日的连接内化为乡土记忆，将赣南地域文化包藏于食物当中，循环往复，最终落笔为一代代人的浓浓乡愁。

“在地性”写作：作者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被反复提及和阐释。有观点认为“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的出生地，而应看作文学的“在地性”。安徽籍作家皖心和辽宁籍作家张晓帆在赣南工作生活多年，分别创作了《远行的人（二）》《坑琴之韵》等作品，她们与赣南本土作家一起，构成了新时代赣南文学的“地方景观”。无论是皖心的“生命”主题写作，还是张晓帆“重返故乡”的写作，都呈现了平凡又坚韧的生命存在，内敛着作者丰沛的情感力量。

福柯曾言：“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白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走进赣南这群女性散文作者的文学空间，她们行走在田野，寻找着自我成长的姿态，在赣南这片红色原野中发现自然之美，风物之美，人情之美。其散文创作中的人事、物事在山川中汇聚成一条纵横赣南的历史文脉，也从侧面呈现出江西文学的温情与气韵。

《客路赣南》中的木梓林、石子坪、鹤山咀，《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中的老屋，《水之秘径》中的吊脚楼与大屋场，《夹湖谣》中的村坊瓦房、围屋、圩场、下山角、屋场、枇杷林……这些场景都是基于真实的历史而写就，作者们在回味童年之时也提炼了当下的生活经验，童年视角与成人后的回味形成了交叉的记忆路径，让笔下的家园更加立体鲜活。

在赣南，稻浪翻滚的时节，“姑娘子结伴下田，摆起肥臀，禾镰一挥稻秆一把把归顺”；立夏时要吃“春”（鸡蛋），端午节顺口溜“杨梅叭叭跌”流行开来，苗婆姨的叮嘱“转了风头，冻桂花”；那些被陈酿的光阴年年岁岁，“春种之后还有夏忙，夏忙之后还有秋收，秋收一过，一切就好办了”……对过往岁月的思考和对当下生活的观照，是作家回身份认同的方式。她们对赣南乡土的倾情抒写，包罗万象，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也呈现出开放性的生长姿态。在新与旧的更迭中，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里，她们尝试着创新叙事手法，如水似的柔情与对自然的敬畏共同生成一种坚韧顽强的审美空间，勾勒出赣南文化的历史时空与当下面貌。

第222期

本版邮箱:32028011@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235